

清代“满蒙联姻”政策演变及影响

□ 狄鸿旭

婚姻家庭是维护人类社会稳定发展的基础制度。“婚姻者，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下以继后世”。在中国古代，统治者往往通过和亲方式联络盟友番邦等力量，利用家族联合体建设政治共同体。至清代，“和亲”的形式和范围进一步发展，并更加规模化和规范化，形成以“满蒙联姻”为主的制度形态，巩固发展了清代的统一多民族国家，有力推动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格局形成。

清代“满蒙联姻”的发展演变

据皇族族谱《玉牒》等史料统计，有清一代，满蒙联姻共595次，其中出嫁给蒙古的公主、格格为432人次，娶蒙古王公之女的皇族为163人次。“满蒙联姻”的发展历程大致分为三个时期：天聪至顺治年间，满蒙联姻成为清朝联合蒙古各部定鼎中原的既定国策；康熙至乾隆年间，满蒙联姻的范围进一步拓展，并形成制度规范；嘉庆年间至清末，皇室宗亲指婚联姻的数量在减少，但是王公贵族之间自愿结亲的人数在增多，满蒙民族间的通婚更为普遍化和民间化。

明朝末年，建州女真崛起，在努尔哈赤征讨女真各部过程中，逐步建立起与邻近科尔沁蒙古部的姻亲关系。随着后金势力范围扩大，联姻对象亦进一步拓展。皇太极先后将岳托、阿敏等八旗贵族之女许嫁巴林、扎鲁特等新附蒙古部，在打败察哈尔蒙古林丹汗，收降漠南蒙古各部后，皇太极将固伦温庄公主嫁与林丹汗之子额哲，蒙古黄金家族的嫡系传人成为皇太极的女婿。由此，漠南蒙古各部共尊皇太极为汗，天聪十年（1636年），皇太极即皇帝位，改国号为大清。

清入关后，联姻关系从漠南蒙古继续拓展到漠北和漠西蒙古。康熙曾五次嫁女漠北，主要联姻漠北蒙古土谢图汗部和札萨克图汗部。这一时期，最受瞩目的与漠北蒙古赛音诺颜部的联姻。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康熙将第十女纯惠公主指嫁时在京城附居、接受内廷教养的土谢图汗部纳木扎勒之子策棱，并授和硕额驸。此后，策棱为清朝防御漠西准噶尔蒙古，屡立战功。雍正

三年（1725年），清廷为表彰策棱，特诏从土谢图汗部析出一部，成立赛音诺颜部，并世代姻亲。

乾隆年间，清朝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统治更为稳定，但满蒙联姻制度仍受到统治者的重视。承平日久，清朝皇室之女往往乐于生活在繁华的京城，不愿远嫁到物质条件差且远离亲人的蒙古地区生活。为此，从雍正九年（1731年）起，清朝实行令蒙古王公子弟入内廷教养的制度，乾隆二年（1737年）起，又开始在漠南蒙古科尔沁等七部十三旗，实行“备指额驸”制，并将指嫁之女的范围缩小到近支宗室，确保每年年底指婚一次，以规范联姻制度。

嘉道以降，满蒙联姻情况又有新变化。一是在百余年的各民族交融发展中，蒙地经济文化不断进步，时人吴振械谈道：“公主、郡主多下嫁者，每苦游牧地方居处、饮食之异。近来附近内地之蒙古各旗，大都建造邸第，不复住蒙古包。饮食丰美，亦与京师仿佛。”二是传统婚姻尤重门第，满族王公在京师选择范围有限，能与蒙古王公结亲，也不失为好的选择。势易时移，清朝皇室之女由“不愿嫁”变“愿嫁”。因此，虽然指婚式联姻仍得以维持，但满蒙王公间的自行结婚已成通婚主流。据统计，从嘉庆年间直至清末，满蒙联姻共172人次，其中皇帝指婚为16次，其余为自行嫁娶。自行结亲现象的普遍，彰显了民族融合发展的历史趋势。

“满蒙联姻”的历史影响

清朝将中国古代已有的“和亲”规模化和制度化，以满蒙联姻为重要纽带，从东北一隅之地入主中原，有效实现了对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继承、建设与巩固。

由姻亲关系而成血缘共同体。通婚是民族融合的重要形式。清代满蒙贵族的长期广泛通婚，由姻亲关系所繁衍的后裔成为血缘共同体。如顺治生母为科尔沁蒙古人，包括康熙帝在内的顺治诸皇子，也自然具有蒙古血缘。至晚清，庆亲王奕劻生母为阿拉善蒙古亲王马哈巴拉之女。庄亲王载勋之子溥纲、端郡王载漪之子溥儀，都是蒙古姻亲所生。满蒙联姻繁衍了数量庞大的贵族阶层，

其中大量主理蒙旗各地事务。此外，联姻还有大量满汉陪嫁人户，据估算，陪嫁人户五代以内的人数就有约10万人，这些人到蒙古地区后，既强化了区域间的联系，也逐渐融入当地。乾隆巡幸科尔沁时曾赋诗“塞牧虽称远，姻盟向最亲”，与明朝主要依靠朝贡贸易绥服蒙古不同，清朝因广泛联姻形成的血缘纽带，不仅蒙古各部服从中央政府治理，也使之成为戍国守边的坚固长城。

由政治联盟而走向命运与共。从历史看，以“姻好”促“盟好”是满蒙联姻的最初目的，如努尔哈赤与科尔沁两部联姻、皇太极联姻林丹汗之子额哲等，最终通过联姻，使清帝成为蒙满拥立的天下共主。联姻也推动了蒙古贵族参与国家军政事务治理。如主理民族事务的理藩院，重要职务多由具姻亲关系的蒙古贵族担任，一些有内廷教养经历的蒙古贵族，也多有出任朝廷官职者。以联姻为基础的政治联盟，逐渐发展为共治国家的政治共同体，并在抵御国家内外部风险中走向命运与共。如康熙十四年（1675年），察哈尔蒙古王布尔尼乘“三藩之乱”之际叛乱，阿鲁科尔沁部札萨克郡王额驸朱尔扎哈拒不从叛，并速报康熙帝协助平叛。

道光以后，尽管清王朝内忧外患加剧，但各地蒙古王公在联姻中受到恩宠优待，深刻认识到自身与清廷的命运与共，不仅在平定内乱中屡立战功，在面对对外侮时，也能团结一致、众志成城。如晚清抵御沙俄侵略伊犁时，土尔扈特等蒙古部主动供应驼马，助阵抗敌。面对英法联军入侵时，僧格林沁率领蒙古骑兵护卫京师，先后取胜大沽口、血战八里桥。及至清帝退位，诸多蒙古王公仍与清皇室保持密切关系。

由交流融合而渐成一体。因满蒙联姻而形成的各民族杂居共处与交流交融，对蒙古地区产生直接而深远的影响。首先是联姻中的陪嫁物品、人口和土地，丰富了蒙古贵族的经济来源。陪嫁物品包括生产生活用品和首饰珠宝等，品类繁多、数目巨大。同时，朝廷还会为公主建造府邸，赏赐“胭脂地”。此外，大批陪嫁人户同来，其中不乏各类手工技艺人员，他们与当地共同生活，传播着生产生活技术。如内蒙古东部科尔沁和西部阿拉善地区的土地开垦，皆由陪嫁人户开始，中部土默特地区的土地垦殖，也在陪嫁人户的开辟下扩展。《蒙古风俗鉴》描述，“达尔罕旗巴岱亲王与清朝公主成亲时，跟随公主来了七十二行的匠人或其他劳动者，在蒙古地方落户，开始了种地、种菜，开荒务农”。至清末，东部蒙旗的农耕经济逐渐取代了畜牧业，成为主要生产方式。内蒙古中西部如河套地区也得到全面开发。再者，由于朝廷为远嫁公主在当地建有府邸，这种“看外精致，内甚宽舒”的京城建筑，引得蒙古王公效仿。随着定居建筑渐为普遍，砖瓦灰浆等材料也从内地运输改为就地烧造，使得兼事耕种的定居生活逐渐被普通蒙民接纳。

与此同时，陪嫁人户这一规模群体与蒙古地方也建立起婚姻关系，使得社会生活和语言习俗等方面的交流融合更为丰富。如满汉群体向蒙古人学习制作奶食品、饲养马羊等，蒙古人向汉人学习耕种和经商。此外，内地文艺也传入蒙地，如阿拉善旗王爷罗布桑多尔济之妻从北京带来了由汉满艺人组成的簧腔班，所演奏的《施公案》《包公案》《薛仁贵征东》等曲目广受欢迎，促进了各族人民生活融合共生。清朝还在蒙古地区普遍开设八旗官学等各类学校，广施文教。可见，内地农业和工商业在蒙古地区的发展，直接影响着区域生产方式和经济结构，进而引导人口流动和商贸发展，推动文化共享和社会生活的嵌入融合，最终形成了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共同体。

总而言之，“满蒙联姻”制度化形态在清朝有效统合区域、族群和文化，塑造空前大一统局面中无疑扮演着重要角色。通过亲属关系建立、政治利益捆绑、血缘地域融合，蒙古贵族与清朝产生荣辱与共、休戚相关的亲密感与使命感，牢固维系着边疆民族与中央政权的统一性。联姻同时保障并塑造了北部边疆的长期稳定和新局面，为北疆和内地的交流创造便利条件，进而为走向自觉形态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为近现代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夯实基础。



从世界文明史进程看西方中心论之弊

□ 魏孝稷

西方中心主义又称西方中心论，是西方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核心，渗透在西方的学术与舆论当中。西方中心论的内涵包含以下三方面内容：一是主张西方文明是特殊的、例外的，只有西方拥有自由、民主、法治、科学、人权等“优越的文明要素”；二是突出西方道路的目的论叙事，宣扬资本主义道路代表“历史的终结”；三是强调非西方社会内部不能产生现代文明，只能借助于西方国家才能实现“进步”。因此，西方中心论者声称西方国家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殖民统治、帝国扩张和霸权主义干预是“正当”的。

西方中心主义的渊源可以追溯至古希腊、罗马人对外部世界的偏见以及中世纪基督徒对“异教徒”的妖魔化建构，但其最终形成并发展为成熟的话语体系是在19世纪。19世纪，资产阶级在西方逐步获得统治地位，在内部寻求资产阶级的价值观以取得有利于强势阶级的文化领导权，在外部实行大规模的殖民扩张，以便为殖民统治提供意识形态上的支持。而西方中心主义恰恰同时满足了资产阶级上述两种诉求。近200年来，西方的学科体系和学术体系不断发展，但是西方中心主义的内在逻辑一直没有发生根本改变。近几十年来，随着亚洲社会 and 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崛起，西方文明的内在缺陷受到学术界越来越多的质疑，西方中心主义也日益遭到批判。

首先，多元文明并存是历史发展的常态，西方文明并不例外。纵观19世纪之前的人类文明形态，主要分布在东亚地区、南亚地区、中东地区、

欧洲地区等，包括中华文明、印度文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古埃及文明、伊斯兰文明、西方文明，等等。其中，中华文明是唯一不曾中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文明，西方文明经历了古希腊文明、罗马文明、中世纪基督教文明几次大规模的更替，断裂性最为明显，中东文明和南亚文明的连续性则在中华文明与欧洲文明之间。19世纪之前的五千年文明史上，除了古典时代（约公元前500年至公元500年）以及公元1500年至1800年间的欧洲文明，可以与东方诸文明相颉颃，其他大部分时间处在欧亚大陆的边缘位置，落后于东方文明。在此期间，欧洲的历史从不缺乏贫穷、暴力、愚昧和文化贫瘠，也不缺乏专制。其次，工业革命以来西方的领先是暂时的，多元文明的回归是历史必然。西方文明超越东方文明的主要标志是工业革命，而不是地理大发现，也不是文艺复兴。从15世纪地理大发现开始到18世纪工业革命产生这近300年的时间里，西方社会主要还是在追赶东方。工业革命改变了东西方平衡发展的格局，使西方迅速超越东方。依赖船坚炮利的军事和经济优势，西方列强在短时间内将东方世界变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至19世纪末，西方列强建立了全球性的殖民体系。人类历史上出现了仅有的一次一种文明称霸世界的现象。但是，这个时间是极其短暂的。随着世界殖民体系的瓦解，获得民族解放的第三世界国家特别是东方国家于20世纪后期迅速崛起，形成了东升西降的发展趋势，多元文明格局回归势不可挡。

在19世纪到20世纪后期，尽管西方国家获得了近200年的全球领先地位，然而有两点历史事实值得深刻反思。第一，西方的底层人民和无产阶级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并未享受到全球领先带来的好处。相对于工业革命前的18世纪，工业革命后，他们的生活状况没见改善，反而下降了。他们集中在狭小的空间内，每天从事着超过12小时的体力劳动。大量儿童进入劳动大军，工业革命时期英国的棉纺纱厂童工人数接近该行业全部工人人数的一半，童工最小年龄仅六七岁。底层人民的经济状况不同程度的恶化，他们没有财力购买小麦和面粉，转而以廉价的土豆为主食。第二，西方的殖民统治制造了大量的暴力和杀戮事件，给殖民地人民带来巨大的生命危害。西方殖民者在建立殖民统治的过程中普遍使用暴力，对反抗者实施残酷的镇压，直接威胁到殖民地人民的生命安全。殖民统治政策间接导致的人口减损数量更大。以英属印度为例，19世纪后期，由于棉花价格上升，英国殖民统治者将稻田改造成棉花种植区，大量财富转移到宗主国，而印度的粮食生产不能满足基本需求，暴发了连年的大饥荒，每年数百万人口丧生。1918—1919年“西班牙流感”暴发期间，印度感染人口的死亡率高于其他国家，这与殖民当局不能采取有效的应对政策有关。另外，英国统治者站在“西方现代医药”的立场上打击印度传统医药，造成当地医疗系统的虚弱，也是致死率增高的重要原因。

最后，资本主义道路并非“历史

的终结”，不同文明不同国家可以在借鉴其他文明成就的基础上选择自己的道路。资本主义以战争、殖民、贩奴等手段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为现代世界创造了极大的物质文明成就。但是，它造成的文明危机也日益凸显，诸如环境破坏加剧、贫富差距扩大、战争风险和人类毁灭自身的风险不断增加、道德和精神价值的弱化，等等。资本主义道路已经不能为现代文明的危机提供新的出路。

总之，回顾世界历史发展进程，西方中心主义把西方社会的暂时领先理解为永恒的文明优越性使然，把资本主义道路理解为“历史的终结”，是历史的短视、缺乏客观依据的、在根本上是不能成立的。西方中心主义曾经为殖民统治辩护、为霸权主义张目，但在当下它正在反噬西方社会。陶醉在文明优越性幻影中的西方资产阶级只会掩盖更多的内部矛盾，并想方设法将内部矛盾转嫁出去，在世界范围制造种种矛盾。因此，西方中心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当前世界动荡的意识形态根源。西方国家只有客观公正地看待自身文明和其他文明，正视回归人类社会多元文明格局的历史常态，才能走出西方中心主义的迷思。



意大利汉学研究源远流长，但是现代汉学的研究起步较晚，威尼斯大学兰乔蒂教授，被认为是现代意大利专业汉学的奠基人物，为意大利的现代汉学研究作出重大贡献。在意大利诸多汉学家之中，秉承兰乔蒂研究传统的正是威尼斯大学的校长、汉学家李集雅（Tiziana Lippielo）教授，主要从事古代汉语、古代哲学与宗教经典，特别是儒家思想与中国伦理研究。

两度到中国大学进修学习。1982年李集雅进入威尼斯大学学习。出于对中国哲学的热爱，李集雅非常坚定地选择了在当时看来很难就业的中文专业。1984年，大三的时候，她曾在北京语言大学进修中文。1985年，她因获得意大利外交部奖学金又来到上海，在复旦大学哲学系学习中国哲学。尽管那时中国大学的条件还比较艰苦，但并不能浇灭她学习中国思想与文化的热情，她潜心学习汉语，从此与中国结下不解之缘。

1986年，她以优等生身份在威尼斯大学毕业。1989年她开始在荷兰莱顿大学学习汉学，师从著名的汉学家许理和教授。1994年李集雅在莱顿大学获得了汉学专业的博士学位。威尼斯大学是现代汉学研究的重镇，从1992年起，李集雅便开始在威尼斯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工作，当时的汉学研究隶属外国语言文学学院，在那里李集雅开始教授汉语。之后，李集雅又教授汉学方法论、中国历史、中国古典文学、中国宗教与哲学等领域课程，开启了她研究汉学、传播中国文化的学者生涯。

将《论语》《中庸》翻译成现代意大利语。李集雅的汉学研究广泛，涉及中国古典文学、古代哲学与宗教，以及中国传统的占卜与预言等，尤其在中国儒家思想方面有自己独特的认识和理解。

李集雅的汉学研究著述非常丰富，著有《儒家》《古代中国的祥瑞与奇迹：汉代、三国、六朝》《中国文化中的长生之药与太上灵宝芝草品》等著作，还继承意大利前辈汉学家把中国经典翻译成拉丁语的传统，把儒家最重要的《论语》《中庸》等经典翻译成现代意大利语。李集雅还担任《凤凰》《中国经典》等系列丛书的主编，发表学术论文40余篇。

《儒家》向意大利读者系统地介绍了儒家思想——一种创始于孔子、贯穿中华文明的礼仪、习俗与思想的体系。书中特别介绍了这位生活于公元前5—6世纪的中国圣人对于弟子的道德教诲，以及他在诸侯官廷中所提议的政治技艺。李集雅在书中特别解释儒家思想的基本原则，强调“礼”的规范意义，重申了礼仪制度和社会习俗的重要价值，强调其中所代表的人们正确的行为之道，以及实现与世界相和谐的生存之道。

谈及翻译《论语》《中庸》的原因，李集雅说道，“这两部著作蕴藏了中国政治思想和伦理的核心价值，阅读它们对于外国学生了解中国人的思想和生活方式非常重要，对于学习中国文言文也有益处”。在她看来，中华文明对于多样性的态度和对于人类不同文明间相互包容的理解，具有重要启示。

李集雅非常喜欢《论语》中的“和而不同”这句话，它对当今世界各国和各种文明相处有着重要启示，即在不强求想法一致的情况下，寻求人类之间的和谐与和平。她认为，我们不必完全一样，应该接受多样性，并鼓励开放、合作与包容，今天的世界应该为此而努力。

致力于中意两国文化交流。因为卓越的学术成就，李集雅担任过威尼斯大学东亚系主任，之后又担任威尼斯大学亚洲与北非研究院院长。2020年，李集雅被选为威尼斯大学第23任校长，这也是该校历史上首位女性校长。李集雅将威尼斯大学的第一个海外办事处设在了中国，让意大利学者有更多机会了解中国教育与科研，建立起了更多的学术研究合作项目，为中意两国学生创造了更多到对方国度学习与体验的机会，使得年轻一代对两国文化和文明有更深入和直观的理解。

对于中国和意大利两国之间诸多文化交流活动，李集雅在学术上都给予大力支持和帮助。她在威尼斯发起或支持了多项文化

坚定的意大利汉学家李集雅：中西文化交流推动者

□ 孙向晨

活动，为中国文化和艺术在意大利的传播作出杰出贡献。威尼斯与苏州、扬州分别是中意最有代表性的水城，李集雅积极推动它们之间的合作。2022年9月30日，由威尼斯大学和苏州大学联手策划发起的《威尼斯和苏州：丝绸之路上的水城》虚拟展览和电子图录正式上线。她还向扬州“马可·波罗纪念馆”提供学术支持，并获得扬州市“城市贵宾”的称号，以表彰她对中意两国文化交流所作的贡献。

2024年，李集雅在马可·波罗这位威尼斯人逝世700周年之际，充分强调马可·波罗对欧亚之间连接与交往产生的重大影响，进一步推动中西文化交流合作走向深入。在威尼斯举办的“马可·波罗：欧亚之桥 继古开今”纪念活动中，李集雅作了题为《中意合作与共享视角：沿着马可·波罗路线的商人、学生和游客》的主题报告，重点介绍了意大利与中国之间悠久的友好交往历史。李集雅说，“在古代，中国人和罗马人就已经开始相遇相知，在交流中发现了两个民族共同的价值观，有着对商贸艺术、热情和正义感的共鸣。这其中威尼斯人马可·波罗对中国的热爱尤为深厚。十七岁那年，他与父亲及叔叔一同出发，跨越中亚直抵中国，作为蒙古帝国皇帝忽必烈的使者，在远东的土地上旅行了十七载。他访问的北京、西安、成都、杭州、苏州、泉州等城市，以其独特的桥梁建筑和繁荣的财富而闻名。他尤其详细描述了苏州的丝绸、纸币、商贸艺术、财富以及民众的勤劳精神”。事实上，李集雅继承了马可·波罗的精神，一直在推动中意文化的交流。在马可·波罗逝世700周年之际，李集雅将推动意大利友人与学生重访这些马可·波罗曾到访过的城市，以促进中意两国进一步理解和交流。

人类如何保持多样与开放，如何追求和谐与和平，这是李集雅一直思考并付诸行动的问题。她认为，人们应该努力克服文化障碍，将文明的亲和性传递给对方，增进相互理解。在西方逆全球化甚嚣尘上的时候，李集雅强调理解包容、携手共进的理念并为之付诸实践，这显得弥足珍贵。

